

## 連宋登陸對兩岸政黨互動的衝擊與影響

余莓莓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論文以安東尼·紀登斯的「結構化成論」為主，輔以亞歷山大·溫特的「社會建構主義」觀點，探索「連宋登陸」的衝擊。連宋訪中擴大兩岸的接觸交往。不管陳水扁以「積極管理」取代「積極開放」，卻不敵市場力量的支配；他的「終統」決策，招來泛藍、中國和美國強烈的反彈，由是民進黨更進一步陷入邊陲化。雖然連宋登陸並未扭轉兩岸的基本結構，但卻已影響其內容。從溫特的觀點看，「觀念」在形塑各方行動者的互動關係上扮演關鍵與主導的角色，並使得民進黨在「紅藍聯手制綠」的策略下陷入孤立。就紀登斯的結構化成觀點而言，新的結構是行動者進行再生產的條件。隨著時間的遞移，在持續互動與生產的循環過程中不斷建構出新的兩岸關係，於此同時呈現某些變與不變的結構風貌。

**關鍵字：**結構化成論、社會建構主義、觀念、連宋登陸、兩岸關係

## 壹、前言——研究途徑與分析觀點

陳水扁的總統第二任期間，台灣政治生態勢的消長，有了明顯的變化。一方面，民進黨處於選舉得票率下滑態勢。另一方面，共產黨與國民黨拋棄半世紀仇恨，走向和解的新起點。箇中，「國共擴大接觸」的歷史插曲扮演了觸媒的角色，並牽引出兩岸「紅藍綠」三角互動關係的微妙發展<sup>1</sup>，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本文企圖以「國共擴大接觸」為觀察切入點，作為認識與分析的結點，並深入探究連宋登陸、國共擴大接觸的結果對於民進黨、國民黨、共產黨三方所形成的結構關係，產生了何種影響與衝擊？而這一段歷史發展過程，所呈顯的兩岸關係的內涵又是什麼？而兩岸的互動從量到質產生具體、根本變化的過程中，2005年的「連宋登陸」，如何催化新結構的產生，並牽動「民國共」此一小三角關係的發展？

本文試圖以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結構化成論」（structuration）的歷史結構作為研究途徑，並兼採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概念來詮釋。不過，本論文對於關心焦點在經驗分析而非理論建構，換言之，對於本文而言，紀登斯與溫特的概念，不過是作為工具，而非研究最終所要呈顯的成品。

紀登斯在其《社會的構成》一書表明：要述說一個有說服力的故事不僅情節要連貫，還要對於行動的場景、環境和起因有所理解（Giddens, 2007: 550）。紀登斯說，社會學家尋找概念，以便將各種不同的特定描述範疇歸入不同的概念；而歷史學家則一定要專注在實際發生的事實，避免做出不當的陳述。二者的分離是徒勞無功的（Giddens, 2007: 552）。問題是：在面對浩瀚如海的資料，我們究竟要如何切入？在筆者的閱讀過程中發現，社會科學中「結構」這一概念，頗能滿足上述分析的需求。

---

<sup>1</sup> 本文將兩岸以中國共產黨為主要代表的紅營、以國（國民黨）、親（親民黨）、新（新黨）三黨為主要代表的泛藍、以民進黨和台聯黨為主要代表的泛綠，三大陣營其政黨之間的關係界定為「紅藍綠」小三角關係。

在筆者的探索過程裡，赫然發現在國際關係的流派中，溫特的社會建構論對於筆者特別具有吸引力，而考察其理論思路又與結構主義的傳統裡的紀登斯，淵源甚深。在社會建構主義的論述中，溫特認為包括規則、制度、社會等人類結構成形之前，人們經由「互動」形成「共有之觀念」，觀念形成「身份」與「利益」(Wendt, 1992: 396, 403)。溫特指出，身份根植於行動者的自我領悟，行動者的身份是由觀念所建構 (Wendt, 2000: 281-82)。觀念不只建構身份，它也進一步建構了利益。易言之，觀念對行動者具有建構的效果，引導行動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再界定「身份」與「利益」，在過程中社會化 (Copeland, 2000: 189-90)。

不過，溫特主張社會結構由觀念所界定，只有當觀念的結構賦予物質力量意義 (meaning)，物質力量才是顯著的 (significant)。因此溫特對於結構的理解最終不免淪於一種理念性的解釋 (idealist explanation) (Wright, 2006: 157-58)，而這種的分析結果往往與會現實脫節，未若紀登斯以結構化成的思維，欲尋求將「結構 vs. 行動者」這組概念，安置在歷史時空變遷過程的脈絡中來處理的手法，那般的細膩與切實。職是，本論文特別回歸到溫特所師承的紀登斯的結構化成來找靈感，盼望透過對於紀登斯結構化成論的重新造訪而豐富溫特社會建構主義的經驗內涵。

紀登斯認為，行動與結構的關係是相互解構和相互依賴的 (Giddens, 1993: 5)。「結構化成」這個概念就是要試圖超越傳統理論中「結構」及「行動者」二元論 (dualism) 對立的困境，而改採結構二重性 (duality) 做論述基礎，強調「結構」及「行動者」一體之兩面、同步發生的關係之觀點來觀照。他認為，「人類的社會活動與自然界裡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種一樣，都具有循環往復的特性。它們不是由社會行動者一手塑成，但卻不斷地由他們一再創造出來。行動者正是通過這種反覆創造社會實踐的途徑，來表現作為行動者的自身；同時行動者們還藉助這種活動，在活動的過程中再生產出使它們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

很清楚地，在紀登斯的結構化成理論中，「行動者」指的是「行動的

持續之流」(a continuous flow of conduct) (Giddens, 1979: 55; 齊力, 2000), 它綿延而發生; 「社會體系」是行動者透過持續的社會實踐所構成的模式化關係 (Giddens, 1982: 35-36); 「結構則是由『規則』和『資源』組成, 而且僅當社會體系構成的這個時刻 (moment), 結構才存在」(齊力, 2000)。紀登斯強調, 行動者經由持續的實踐活動生產了結構, 而結構同時又是行動者進行再生產的條件。在行動者與集體間的再生產關係當中, 每一行動固然有助於結構的再生產, 但其本身同時也是生產的行動。它有助於既有結構的再生產, 它可以藉由改變結構而導致變遷, 它具有塑造社會結構的能力。由此可知, 「結構化成」即是指支配結構持續或轉型及體系進行再生產的條件, 它蘊涵著超越「結構 vs. 體系」或「結構 vs. 行動者」的靜態二分法, 而主張將這組概念放在動態過程的脈絡中觀察。

本研究以紀登斯的「結構化成」為研究途徑, 配以溫特的社會建構主義, 試圖藉由歷史事件或人物以及其所立足的時空位置的分析, 進行因果解釋與推論。在資料的選取上, 除了採用文獻、報章與數量記錄, 更進行深度訪談, 尤其針對從事制定兩岸政策的官員、重要學者、朝野政黨人物、相關利益團體負責人, 進行有系統的訪談。

## 貳、兩岸互動結構由緊轉鬆的變遷

### 一、台灣民衆對兩岸關係趨向正面觀感的變遷

中共透過邀請台灣在野黨領袖訪問中國, 不斷藉由釋放各類有關兩岸交流訊息的「善意」, 從江丙坤與陳雲林簽訂的『12項共識』、『連胡公報』到『宋胡公報』, 中共操作對台議題, 並且配合相關的政策與作為。在國親兩黨主席訪中之後, 中共的接觸網絡由在野黨黨公職與民間同步交織進行, 台灣社會頓時呈現一片大陸熱的氣氛, 對於兩岸問題的態度, 台灣內部從政黨到民間, 也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首先, 中國以超高規格的禮遇

連宋兩位黨主席，並在媒體鏡頭前刻意凸顯平等、尊重與情意。中國當局的正面形象首次成功地實現了大規模的「入島入戶入心」（徐博東、馬淑明，2005：88），隨之而來，就中國對台敵意的認知上，台灣的民意在連宋訪問中國之後開始有了明顯的變化。

依據國策研究院委託柏克市場研究公司在『反分裂國家法』通過前夕的 2005 年 3 月 9 日至 12 日所做的民調顯示，認為大陸政府對我政府的態度不友善（含不友善與非常不友善，下同）的比例，高達 79.1%。對台灣人民不友善的比例，亦達 62.8%（陸委會，2005a）。但連宋相繼訪問中國後，陸委會委託政大選研中心於 2005 年 5 月 4 日至 6 日所做的民意調查資料顯示，有 45.4% 的民眾認為大陸當局對我政府不友善，有 37.3% 的民眾認為大陸當局對我人民不友善，與前述 2005 年 3 月之調查結果比較，認為對我政府不友善的比率遽降 33.7%，認為對我人民不友善的比率亦下降百分之 25.5%，均為歷年以來調查結果的最低點。此外，多家報刊電視等大眾媒體所做的民調也呈現類似的結果<sup>2</sup>。

連戰的登陸訪問，讓兩岸關係由原來的「對抗」結構的狀態往「對話互動」結構的狀態移動。國共之間經由接觸與交往形成新的認知，過去歷史上生死存亡的對抗俱往矣，雙方不再是零合鬥爭的敵對身份，而是可以既合作又競爭。在此可以看出「觀念」對行為體具有建構的效果，引導行動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對於身份與利益加以重新界定。而國民黨透過政黨

---

<sup>2</sup> 此外，《中國時報》於 2005 年 4 月 30 日的民調，50% 的民眾認為「連胡會」對兩岸關係有正面影響。同一日，《聯合報》公佈的民調，56% 的民眾肯定「連胡會」的進行有助於兩岸的和平發展，感受兩岸關係趨於緩和的受訪者也達到 31%，這是《聯合報》相關民調自 1998 年辜汪會談後的新高點。而在該報稍後於 5 月 13 日所公布的民調更顯示，感覺兩岸關係趨向緊張的人，從『反分裂法』通過後的 47%、連戰訪問大陸後的 17% 再降至 9%；覺得兩岸關係趨於緩和的人，由連戰大陸行之後的 31% 增為 36%；電子媒體所做的民調也顯現類似的結果。根據 TVBS 電視於 5 月 2 日所做的民調顯示，55% 的民眾認為連戰訪問大陸有助改善兩岸關係。而年代電視所做的民調中，54.7% 的受訪者認為連戰訪問大陸，對台灣社會和未來兩岸關係有所幫助。以邀訪連宋為突破口，透過媒體成篇累牘大篇幅的報導，北京當局成功地降低了台灣人民認為其對台不友善的觀感。

交往對於兩岸交流所起到的正面與積極建構，更帶動了民間的互動。民間社會經濟的支持作為一種社會資源，乃因國民黨所主導的海峽兩岸政黨交流在政治觀念上的突破與帶動，也跟著在不同的階層、族群、行業、地域與中國大陸展開了更廣闊與更綿密的交流。從權力運作的角度來看，國民黨可以說搶奪了這一龐大資源的意向與流向的主導權；反觀，執政的民進黨既無法與共產黨在一共有觀念的基礎上，相互建構穩定的互動模式，且受制於與對岸在意識型態與政治利益的對立以及在安全把關上的責任，處處顯得被動與保守。在兩岸交流環境鬆弛，而執政黨卻操作易於引起兩岸緊張的政策工具時（包括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加入聯合國、正名等等），自然地成為主動將「交往」這一區塊的詮釋權讓渡給國民黨。

### 參、國共擴大交流促使台灣民眾對中國敵意的降低

在中共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之後，北京當局為轉移國際輿論的焦點、解消台灣內部的反彈壓力，以及舒緩兩岸關係持續緊張的對峙氣氛，並藉此向台灣社會、美國、歐盟表示，『反分裂國家法』僅僅是針對扁政府所代表的台獨勢力，擴大國共交流以彌補『反分裂國家法』的負面影響。而國民黨方面，對於共產黨的邀請積極回應，這可謂是客觀情勢條件下一個合理的決策行為。對於代表參選總統失敗的國民黨主席連戰而言，外在不利的政治環境固然一方面逼使其必須重新尋找新的政治舞台，但於此同時卻也給予其擺脫國內選舉因素制約的機會，一舉跳脫藍綠爭鬥的框架<sup>3</sup>。尤有進者，中共邀請連宋登陸訪問，另一個巨大的紅利則是加強反獨的作用。依據作者訪問國民黨黨務主管 A 與廈門大學研究台灣事務的知名學者 B，

<sup>3</sup> 以世界龍頭，在兩岸關係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美國而言，其官方立場便多次表達樂見因連宋登陸開啓了兩岸的對話，認為有助於兩岸的和平。甚至在 2005 年 9 月 13 日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總務委員會議，針對我國友邦提出的『和平案』，中國代表以台灣的在野黨領袖訪問中國受到兩岸民眾的支持，作為有力的宣傳，藉以反駁『和平案』，並且辯稱『反分裂國家法』的制訂。

兩人共同的解讀皆認為，連戰成功地向中國大陸民間傳遞了「台灣仍有相當一部份人不贊成台獨」的訊息，緩和兩岸劍拔弩張的情勢；B 更進一步指出，過去北京當局鮮少有機會在台灣媒體報導中展現正面形象，但連宋訪問中國，透過媒體大篇幅的報導，取得相當良好的宣傳效果，可望降低台灣人民對中共政權的敵意，弱化台灣內部對台獨的支持力量，這是意料之外最大的收穫之一。誠如溫特所言，觀念建構身份與利益，當行動者基於反思性而重新定義其身份和利益時，結構就發生變化。

更積極而言，北京透過與泛藍的聯手，成功地在台灣內部構建了「紅藍反獨聯合陣線」，泛藍陣營為胡錦濤創造了一個對台統戰鬆解台灣人民心防的機會，同時帶給民進黨政府壓力（Lin & Lin, 2005: 83）。中國方面即有學者就此做出剖析，認為只要國共之間透過政黨交流所建立的管道維持暢通運作的功能，北京的影響力就可以持續不斷透過此一管道，直接滲透到台灣內部，減損民進黨政府長期以來對中國不利形象的塑造，削弱其帶有敵意與仇視的論述，從而影響台灣的民意趨向，逐步達成孤立台獨勢力的目的（朱松嶺，2005），而讓中國「大一統」文化更進一步深入與擴張。從溫特的角度來看，觀念界定身份與利益，當兩岸的集體身份認同在互動的過程之中穩固形成，進而對於兩岸利益的界定與行為的選擇產生影響，對紅藍合作產生正面與積極的作用。再從紀登斯「權力」的概念來看，新的兩岸的集體認知，將有助於北京與支持統一的政治勢力有效吸取台灣內部新的社會資源與認同，從而孕育結構性的轉化能量。發展至此，連戰的登陸訪問讓國共雙方營造和解風潮，此一舉措雖仍未化解兩岸因為主權僵局所形成的「對抗性結構」，但無疑地，卻使辜汪會時期的「對話性結構」重新浮出。這裡也透顯出這種新的狀態對於往後的「紅藍綠」小三角關係，在在形成了一定的衝擊效應，從而產生新的發展與變化。

## 肆、「紅藍聯手制綠」結構的變遷

### 一、中國以利誘為主導的對台統戰策略

連宋來訪過程，北京與國親兩黨分別簽訂了『連胡公報』與『宋胡公報』，連同前此制訂的『反分裂國家法』，北京以「一法二公報」架構完整的對台政策框架<sup>4</sup>。而深入探究此二公報，中共當局最大的成果莫過於得到了「九二共識」的承諾，在此一基礎上擊劃了國共擴大交往的各種圖像。總計 2005 年國、親、新三黨訪問中國，談出了政治類、經濟類、社會類、文化類共 63 項議題，除卻政治類沒有獲得結論共識外，其他領域的議題都是可能推動或可望實現的，這已可視為北京當局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的切割處理（董立文，2007：114）。

以國共擴大接觸為起點，中共陸續推出了一系列以「利益」為導向的政策與措施。到了 2006 年 4 月，由連戰領軍帶領包括黨公職與企業家在內的 400 多位團員出席國共「兩岸經貿合作論壇」（第 1 屆國共論壇）。這是一次紅藍聯手端出的政治大餐，台灣眾多企業家出席參與，其產值總和相加竟達台灣年度國民產值的半數，聲勢驚人。更由於這一次論壇在中國舉行，中共充分掌握主場優勢，並以「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分流作法，勾畫出「以民逼官」和「以商圍政」的戰略目標，其內涵充分展現在陳雲林於論壇閉幕式上所宣佈的 15 項優惠台胞的政策措施，涵蓋了農業、漁業、旅遊、教育、醫療和中國海關等各層面。不僅統戰從業人員且及於事業主，就選票的結構而言，更具有鬆動綠色票倉同時拉攏中間以及年輕選民之效。

---

<sup>4</sup> 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在 2008 年 3 月 18 日《自由時報》專訪中深入剖析胡錦濤透過「一法二公報」建構對台政策框架的背景。他指出北京在制訂『反分裂國家法』後，利用連戰與宋楚瑜於在野時的政治上最低潮時候，召喚他二人簽署『連胡公報』與『宋胡公報』，配合建構並完成此一對台的框架。此二公報等於是『反分裂國家法』的下游產物，三者可做對照。

在經貿領域之外，農業領域是中共另一個對台統戰施力的重點。中共選擇以「農業交流」作為對台政策的主攻項目之一，除了擴大統戰對象的目的外，同時也是要瞄準民進黨執政根基所在的綠色票倉，藉以鬆動民進黨的支持基礎。2006年10月，紅藍攜手於海南博鳌舉行「兩岸農業合作論壇」（第2屆國共論壇），再深化對台灣農民的工作。會中主要的成果為通過7項共同建議，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國單方面可採行的措施，且基本上限定在民間團體，不受台灣政府的公權力拘束。會後中國並立即宣佈20項擴大和深化兩岸農業合作的新政策措施。而綜觀這20項措施之內容，仍然圍繞在台商投資及台灣農產品銷中兩大主軸，主要是大陸單方向釋出優惠政策，創造有利經營環境以吸引台灣的資金與技術。

到了2007年4月，「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第3屆國共論壇）在北京舉行，本屆論壇之主題為「直航、教育、旅遊觀光」，會議總計達成5項共同建議。而一如歷屆國共論壇的慣例，北京利用論壇閉幕之際釋放13項利多措施。中共特意選在國共論壇，透過上述可操之在己的措施的發佈，意圖達到增益兩岸人員往來，擴大和深化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的目的。

從第一次「連胡會」後到第3屆國共論壇閉幕式上，北京合計釋放了48項對台經濟優惠措施，北京為國共平台大力加持的用心充分流露，然而北京所提供的這些片面優惠政策當中，有許多並不是國共論壇的主要議題或共識，中共不過是藉由此一場合宣布，以擴大對台灣人民的統戰與宣傳效果（邱垂正，2007：112），同時更藉此巧妙地為泛藍塑造形象，助勢加分。北京刻意繞過民進黨政府，改以由台灣在野黨作為後盾的民間交流模式，正所謂「透藍看綠、借藍引綠、靠藍促綠」（徐博東、馬淑明，2005：91），北京當局利用以「利益」為導向的政策施行，拉攏、聯合所有可團結的對象，由下而上，形成台灣對中國傾斜的推力。

## 二、「紅藍聯手制綠」結構的逐漸浮現

紅藍兩大陣營開啓的密切交往，兩岸間的互動不只出現量的改變，也

出現了質的變化，特別是表現在紅藍擴大交往，甚至隱然形成結盟的態勢上。國共彼此構建的新舞台，已成為新規則與資源的一個孕育所和交流互動的新核心。而共產黨是集黨、政、軍、特於一身一言九鼎的玩家，國民黨則儼然成為兩岸交流中台灣方面權力的代理者。而就中的某些議題更是對民進黨政府帶來巨大的政策開放壓力。最典型的例證即是，2005年6月陸委會主委吳釗燮宣布，政府將在建立完整配套的基礎上，優先推動「貨運包機」、「台灣農產品輸銷中國大陸」及「中國大陸人士來台觀光」三項兩岸協商議題（陸委會，2005b）。尤有進者，紅藍兩大陣營以政黨交流為切入口，更以紅藍年年盛大合辦的國共論壇，在逐步發展成形的「紅藍制綠」架構中，發揮關鍵平台的作用。

2006年4月首屆國共論壇在北京召開，眾多台灣企業鉅子不避政治敏感出席會議，震動扁政府。畢竟，企業界的熱情參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泛藍陣營政治實力介入支持的期待。2006年10月，第2屆國共論壇在海南博鳌舉行，鎖定目標族群為台灣農民，國共並且達成7大共同建議與20項優惠政策，表面上看似為兩岸的農業合作創造共利雙贏，事實上是著眼於吸引台灣的資金與技術。尤其，北京片面與台灣泛藍在野黨達成農業合作的共識，卻刻意繞過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在兩岸公權力未協商、介入下，實難以期待落實兩岸農業合作利基，究其實，紅藍兩大陣營的深層考量還是在於透過合作改變現存結構的戰略佈局。

2007年4月第3屆國共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設定為「直航、教育、旅遊觀光」。這些議題無一不涉及公權力事項，理應由雙方政府同意授權及主導，且兩岸就此在相關安全管理及配套措施，已進行多次技術性磋商，依理兩岸談判單位自應在現有基礎上繼續前進發展。然而北京卻透過國共論壇此一不具公權力性質的體制外管道發佈利多，橫生枝節。顯然北京希望利用與國民黨的聯手，針對協商中的議題進行政治算計。說到底，第三次國共論壇的操作模式，仍不脫「紅藍制綠」的格局與思維。

中國有意避開與民進黨政府對話，而與在野泛藍陣營合作，以讓台灣

的執政黨陷入兩難：緊縮，恐造成兩岸經貿的損失；放鬆，將使公權力邊緣化。北京更運用「區隔對待」的策略，技巧地透過讓利予與之接觸合作的對象，利用與泛藍政黨擴大交往為軸心，一步一步將力量深入台灣社會內部，藉以增益對於選票的影響力，從而促成政治生態與政治版圖的改變（朱松嶺，2005）。相對於軟手策略的靈活彈性，中共在硬手的一面對台灣卻更加強硬。北京一方面不斷對台增加導彈威脅與軍備擴張藉以恫嚇，另一方面則在外交上透過層層的圍堵與打壓，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面臨緊縮，尤其在主權的議題上寸步難行。總的來看，北京當局意圖藉由胡蘿蔔與棍棒的交互作用，透過對台灣從經貿到外交的戰略性包圍與孤立，將台灣編入其體系而對它進行主宰，這是北京對台政策動機的發軔，也是最終目標的依歸。從整體「紅藍綠」的小三角關係看來，北京確然是掌握了權力運作所賴之規則與資源的主導優勢。

反觀，自連宋登陸以來，小三角關係的變遷確實令民進黨陷入較為不利的處境。自 2004 年年底「三合一大選」綠營當贏未贏，執政的民進黨支持度一路走跌。到了 2006 年上半年開始，綠色陣營在環繞總統府高層弊案、總統女婿及親家牽涉內線交易等連串的醜聞糾纏下，形象受到嚴重打擊，期間紅衫軍「倒扁」行動，更引發政局動盪不已。2006 年 11 月第一夫人吳淑珍因國務機要費案遭起訴，一時之間陳水扁的政權可謂風雨飄搖岌岌可危，執政當局的統治權威與正當性受到重大傷害。中國乃在某些方面，取得主導兩岸發展的先機。在連宋登陸後，與中共方面由接觸進而擴大交往再到多層次的合作，彼此間經由不斷的互動、交會、回饋與生產的循環過程，逐漸慢慢浮現出「紅藍制綠」的新模式化關係。

## 伍、民進黨政府的挑戰與回應

### 一、民進黨政府的政經挑戰

#### （一）政治結構的壓力

##### 1. 從「九二共識」到「兩岸一中」的壓力

對於民進黨政府而言，連宋登陸在政治層面最大的衝擊，莫過於陷入與中國主權之爭的糾纏。依據作者對民進黨執政時期主管兩岸事務高層官員 C 的訪談，其表示連胡會達成共識後，連戰利用藍營在國會的多數壓迫行政部門執行，壓迫政府最力的就是要政府承認「九二共識」，這等於是國共聯手壓制政府。緊接其後的宋楚瑜登陸，由於先前已曾進行「扁宋會」達成「十項共識」，外界普遍解讀，這是陳水扁透過宋楚瑜的大陸行向北京當局「投石問路」，宋楚瑜的往訪北京，背後其實有著陳水扁的身影。然而，事情最後的演變發展卻是，胡錦濤與宋楚瑜所簽訂的會談公報，不只接受「九二共識」，且以新創的「兩岸一中」名詞作為對「九二共識」的詮釋。對扁政府來說，這恐怕是比「連胡會」更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府院黨同步強力抨擊，「扁宋會」至此走向難堪的結局。在紅藍聯手下，民進黨政府面臨益形沈重的政治壓力。

##### 2. 軍購波折加深台美關係的疏遠與惡化

在連宋返國之後，國親對於民進黨政府力推的「軍購案」極力阻擋。表面上最主要的理由雖是反對「凱子軍購」，但國親兩黨也多次表示，台海和平的根本解決之道是兩岸關係的緩和，且如對照『連胡公報』與『宋胡公報』均可見到「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內容，不難理解國親在國會不斷聯手阻擋軍購案通過的原因，箇中恐不乏「連胡會」、「宋胡會」共識的考量，以及不願傷害連宋登陸之後與中共之間已建立的良好互動關係。國親聯手阻擋軍購，對中共來說，

毋寧是一項重大的收穫。2001 年小布希總統即批准 3 項重大對台軍售，但台灣方面卻因為立法院在野黨的杯葛，遲遲無法通過軍購預算，美國官方對此頗有不滿與不耐<sup>5</sup>，而官方之外，美國國內也始終存在台灣不應存有「搭便車」心態的聲音<sup>6</sup>，美台關係的步入低潮，軍購案的遲滯也是其中的重大因素之一。

綜合以觀，依照『連胡公報』與『宋胡公報』的精神與內容，在硬權力的層面，由主權、軍事乃至外交，北京的對台政策由兩岸定位、軍購乃至國際空間參與的問題，確實有越來越硬的傾向。反觀泛藍陣營方面，卻是由於國共擴大接觸與交往的結果呈現明顯的變化。這正是國民黨經由與共產黨互動交往後，形成觀念與規範上的變化，並進而影響國民黨原來對國共雙方身份與利益的界定，在新的身份與利益認知下，國民黨的兩岸政策自亦隨之產生改變。而從結構化成的觀點看，在國共擴大接觸所架構出的結構關係上，不管連戰日後扮演何種角色，其所導演出的這一平台與框架，將成爲後續新結構再生產的基礎。

---

<sup>5</sup> 2004 年 12 月 10 日，美國國務卿阿米塔吉接受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專訪，其回答主持人提問時表示，『台灣關係法』並未規定美國捍衛台灣，如果中國對台動武，美國是否出兵防衛，必須由美國國會決定（楊孟瑜，2004）；以阿米塔吉鮮明的友台形象，如此的言論內容顯不尋常，當時即有評論者指出，阿米塔吉的談話從某種意義而言，可能是與台灣立法院遲遲未通過新台幣 6,108 億元的對美採購軍事武器預算案有關。2005 年 7 月 21 日，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在「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就有關中共全球策略聽證會的證詞表示，台灣應認清中國的威脅，加強國防防禦能力，如果台灣不重視自我防衛，美國可能重新評估是否介入台海衝突（Schriver, 2005）。同一年度美國國防部提交國會的《中國軍力評估報告》中即直言以爲，中國年年大幅增加軍事預算，台海軍力逐漸失衡，而台灣的在野黨卻一直在國會阻擋軍購，令人質疑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2006 年 2 月，美國國務卿萊斯甚至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美國對台灣一直無法就自己所提出的防衛現代化有所進展深感失望（U.S. Congress, 2006）；2006 年 10 月 26 日，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楊甦棣特別召開記者會，提出軍購必須在該年秋天解決，並表達對若干政治人物「倒扁」與「反軍購」的作法不以爲然。楊甦棣有違外交慣例的舉措，實已充分顯現了美方對於軍購案遲遲無法過關的不滿。

<sup>6</sup> 美國學界認爲台灣不應該在購買武器上存有「搭便車」的心態者亦不乏其人，例如 Ted Carpenter 的意見可謂典型代表（Carpenter, 2007）。

## （二）經濟結構的壓力

### 1. 國共聯手壓迫民進黨政府經貿開放

中共透過各類利多政策的釋放，在台灣內部形成了由國會到民間，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化學效應與衝擊，給予民進黨政府重大的政策壓力。首先，中共送出的第一份以大禮就是擴大部分農產品免關稅銷中與貓熊來台。根據作者對官員 C 的訪談，其指出國民黨不斷掏出農產品登陸免關稅、農業交流採購等等惠台政策，配合 TVBS 電視台持續放消息說政府不願開放，不考慮農民死活，但實際上政府對此並無干涉與阻撓，因為當時就已有農產品銷往中國。站在民進黨政府的立場，如果兩岸的農業交流要更加迅速且更能確保台灣農民權益，則包括檢疫、通關、入境都涉及到政府公權力需要介入協商，且政府已迅速回應，指派輔導農產品外銷經驗豐富的外貿協會作為對口單位，但中國方面不願意，堅持要我方指派實際上是國民黨樁腳的省農委會前往協商。在民進黨政府看來，這正是國民黨利用此一議題不斷擠壓政府，是典型的「聯共制台」。

同理，「貓熊來台」也是屬於同一種性質的政治操作。C 表示，國親兩黨不斷在國會質詢責難，質問政府為何阻擋貓熊來台？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如何能接受中國利用「國內貿易」的方式，由一個省運到另一個省的定位來進行相關事宜？中國與泛藍陣營交流熱絡良好達成多項合作協定，卻拒絕與執政的民選政府進行協商，其目的就是要在過程之中達到對民進黨政府的孤立化、邊緣化與虛級化。民進黨政府的兩岸政策在國共聯手夾擊下，確實倍感艱辛。

面對中國綿密拋出的政策風向球，伴隨這些政策議題透過媒體傳播在台灣社會造成的聲勢與熱度，陸委會在 2005 年 5 月份即接受交通部建議，把大陸居民來台觀光和兩岸貨運包機合在一起和對岸談判，且不排除增加海運直航的議題（中共研究雜誌社資料室，2005：178）。2005 年 6 月 12 日，行政院長謝長廷宣佈，政府將委請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與外貿協會，協助聯繫安排協商兩岸貨運包機與農產品銷中等議題。到了 2006

年國共「兩岸經貿論壇」開議前，民進黨政府搶先發佈開放中國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上述這些兩岸政策的調整與開放氣魄的比拼，判斷上應不出政府在面對連宋登陸後，中國連續出招、台灣在野黨利用國會多數的優勢以立法影響行政，以及媒體擴散議題熱度的態勢下所做的政策回應，其結果也逼使了民進黨政府在部分的兩岸經貿政策上位移了原先設定的時程與軌道。

### 3. 「國共論壇」以商圍政的壓迫

2006年「連胡再會」，國共攜手盛大合辦「兩岸經貿論壇」，連戰率領了多位重量級的企業家與會，北京方面更是充分掌握主場優勢，大手筆地片面宣佈實施各類可操之於己的經貿政策與措施。在北京當局的盤算裡，上述的優惠政策可能引發更多台灣民眾到中國發展，對民進黨政府構成一定程度的壓力，而總的來看，中國這些開放性、實用性、積極性的對台政策與便利措施，精確瞄準台灣現階段不同行業族群的現實需要，胡錦濤如此重視「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究其實應可推斷為北京當局已捨棄與台北打交道的想法，而改為直接向台灣民眾訴求（邵宗海，2006：228）。

特別是，第二次的「連胡會」，顯然是一場紅藍聯合的政治戲碼。中國對台 15 項優惠措施的提出並非純經濟意義，而台灣大企業爭相前往露臉，更涉及了中國「以商圍政」策略的運用，其間的指標性象徵意義，實帶有為泛藍台灣選舉加持的意味，在在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對於民進黨政府而言，「兩岸經貿論壇」能一舉邀得如此多重量級的台灣企業家與會，可謂為嚴重警訊，該屆論壇開議前夕，陸委會搶先宣示兩岸新政策，就客貨運包機和陸客來台觀光，希望中國方面 6 個月內和台灣完成協商（林妙容等，2005：A2）。更進一步，隨後在 8 月份召開的「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各界深切關注的「放寬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 40% 的上限」，在幾經行政部門的協調與折衝下，終於改列為結論當中的其他意見，以作為行政當局未來的施政依據或重要參考，為日後部分兩岸經貿政策的調整與開放預先奠定基礎。這又是以「連胡會」共識為依據，連串政治實務操作後，影響實

質政策面的明顯例證。實際上可以看出，在第一次「連胡會」後每年定期舉行的國共論壇，其主題或有小異，但在一連串以商圍政的政策操作下，扁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確然遭逢一定程度的壓力與挑戰。

## 二、民進黨政府的逆勢操作

### （一）「積極管理」取代「積極開放」

爲了避免台灣過度地向中國傾斜，陳水扁在 2006 年元旦祝詞講話中表示，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將由過去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走向「積極管理，有效開放」。該政策由人員、投資、農業、金融等面向，加強對中國投資申請案件事前審查與事後追蹤管理。其中最主要的措施爲對重大投資案增列「政策面審查」，以確保投資案對國內經濟之利益。可見執政的民進黨十分憂心兩岸經貿互賴的結果，不只會使台灣產業空洞化，而且還可能會導致中國透過經濟手段「不戰而屈人之兵」，實現對台灣的併吞（李英明，2001：118）。然而，受制於「紅藍制綠」的格局，民進黨對於「準執政黨」的國民黨無計可施，既不敢大方地踏進兩岸互動戲局，也不敢破釜沈舟地否定紅藍架構與營造的規則與資源，半調子的作法等於是默認國民黨對中國的交往政策。同時，藍營對於民進黨政府「積極管理」政策大加批評甚至以「鎖國」名之，然而證諸現實卻是，即使民進黨政府採行「積極管理」政策，實際上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額仍呈現持續成長<sup>7</sup>。但觀感上卻已使扁政府對兩岸經貿現狀的憂慮變相爲無力處理的無能形象，其所能掌握的民意資源，也就充滿漂流特質，而無法使基本盤因而擴大。由「積極管理」取代「積極開放」所產生的政策效果，乃晦暗不明。

<sup>7</sup> 2006 年開始實施「積極管理」政策，2006 年 1 至 6 月台灣對中國大陸進出口總額爲 358 億美金，2007 年同期相比，進出口總額增至 402 億美元，同比成長 12.21%。2008 年 1 至 6 月，台灣對中國大陸進出口總額爲 538 億美金，與 2006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50.19%（經濟部，2007；2008）。

## (二) 從「廢統」到「終統」的努力與波折

連宋登陸的效應，不只在「紅藍綠」小三角，同時也在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上產生了發酵的作用。躊躇滿志的連戰欲繼續保有其在兩岸關係上的路線與戰果，然而接任黨主席的馬英九，現實上既握有黨機器，資歷上又曾擔任陸委會第一任特任副主委，豈堪在其治下的國民黨兩岸政策只是「連規馬隨」？事實證明，馬英九接掌黨主席後，幾乎是迫不及待地利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機，拋出他在兩岸政策上的理念，欲爭回兩岸議題的主導權，衝破「連胡會」共識所加諸於其上的束縛，而「終極統一論」就是馬英九所丟出的第一顆震撼彈（Adams, 2005）。此語一出震撼各界，其後座力之強，甚至引發了陳水扁決定廢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sup>8</sup>。外界一般的解讀認為，陳水扁「終統」的決策，主要的導火線就是針對馬英九的「終極統一論」而來，目的在拉回台灣內部日益向中國傾斜的天平，維護台海現狀。

而在陳水扁考慮「廢統」之後，華府方面在中國官方正式回應之前，就表達了強烈的關切與壓力<sup>9</sup>。2月中旬，中國副外長楊潔篪前往華府訪問，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海德利與副國務卿佐立克會面時，要求美方必須做處理（Glaser, 2006: 38）。期間美方曾傳出小布希派遣國安會亞太資深代理主任韋德寧前來台北，表明美方反對該案的立場（崔慈悌、薛孟傑，2006：

<sup>8</sup> 2006年1月16日，陳水扁於接見美國民主黨政策菁英團團員時表示，所謂「終極統一論」完全違背主權在民的民主精神，台灣的前途、未來與命運只有2千3百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1月29日陳水扁在台南縣與鄉親歡聚新年團圓餐敘前致詞時表示，台灣應該要走自己的路，並應認真思考否要廢除國統會、廢除國統綱領此一嚴肅的課題。2月9日立法院長王金平轉述與陳水扁會面時的談話表示，陳水扁對馬英九對國外媒體表示「兩岸統一是終極目標」的說法相當地介意，認為如不有所宣示，就會形同為馬英九的說法背書，這將誤導視聽，也侵犯人民選擇未來的權利。

<sup>9</sup> 美國國務院於1月30日發表書面聲明表示，重申美國不支持台獨及反對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支持和平解決分歧，美國也敦促兩岸進行實質的對話。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則在2月8日的記者會上將「台灣當局領導人」定位為兩岸關係、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麻煩製造者和破壞者。緊接著於2月9日的記者會上，「感謝」美國對「台灣當局領導人」廢除國統會等談話的強烈回應，並重申中國將以「胡四點」對台方針，繼續推動兩岸關係朝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

A4)。美國國院副發言人厄立、發言人麥克馬克也連續公開呼籲台灣自制，不要採取任何會引起台海緊張或被視為片面改變現狀的行動<sup>10</sup>。2月26日，北京方面再一次出手，嚴厲批判扁府徹底背棄的「四不」的承諾（國台辦，2006）。為了避免直接破壞「四不一沒有」的框架以留有各方的迴旋空間，美台雙方在幾經反覆折衝協商後，決定以「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國家統一綱領』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作為最後的結論，雙方各自保留表述空間。2006年2月27日，陳水扁於主持國安會議時做出「終統」的裁示。可以看出，美國基於避免任何一方改變現狀之舉，採取了更多清楚而介入的行動(Saunders, 2005: 991)。

而就在「終統」事件落幕後的極短時間內，美方迅即邀請台灣最大在野黨黨魁馬英九往訪，並安排多位實際決策台海事務的高階主管與之晤面。美方此舉固有摸索馬英九兩岸政策的態度與立場的考量，但更重要的是，藉由在藍綠之間遊走以取得平衡牽制。民進黨政府看似以字面上「廢止」代替「終止」的妥協，奮力在美、中各欲主導界定「現狀」的現實上多撐開一些空間，卻也相對在「維護現狀」的角力點上，付出站在美、中、泛藍對立面，日趨邊陲化的代價。而美中台三邊四角，就在這樣持續互動、回饋、生產的循環過程中不斷建構出新的模式化關係，型塑了兩岸關係的新樣貌與新變化。

## 陸、結語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看到一個全面性的發展圖像：由於民進黨與國民黨、共產黨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皆存在無法妥協的困局，因此陳水扁於

---

<sup>10</sup> Erel 在多次國務院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有關美國方面對於陳水扁計畫「廢統」一事的看法時，每次都會提到美國反對兩岸片面改變台海現狀、鼓勵兩岸進行對話以降低台海緊張，參見美國國務院網站：Erel (2006a, 2006b, 2006c)；Sean McCormack 在 2 月 7 日的國務院例行記者會上，有關「廢統」案，亦再次重複上述內容，詳見美國國務院網站：McCormack (2006)。

2000 年上台之初雖致力於往中間路線移動，但政治立場的認知不同，導致彼此的詮釋相左，再加上國共對於陳水扁的兩手策略極不信任，使得彼此間的關係始終無法改善。結果是，陳水扁開展兩岸關係的成績乏善可陳，既無法得到中間選民的青睞，同時，也遭致深綠群眾對其走中間路線必要性的質疑，在左支右絀的狀況下，陳水扁被迫再回到深綠路線，藉以鞏固其執政基礎，避免兩頭落空。這是緣於現實情境制約下一個當下的判斷與選擇的結果，卻也讓自己走入邊緣化的境地。

從整個歷史脈絡來看，連宋的登陸訪問，促動了國共兩黨更密切與熱絡的交往，黨政最高領導人面對面的互動，以及由之而帶動底層在突破禁忌之後的綿密交往，使得小三角關係的模態與內涵有了巨大的變遷。連宋登陸前原為「藍 vs. 綠」／「紅」，紅藍之間互動結構極其微弱，及至連宋大陸行之後逐漸演變而成「紅+藍 vs. 綠」相對明朗與堅實的格局。於是，一種在性質上帶有「紅藍制綠」成分的新結構，大大出乎各方行動者事前的設想逐漸成型。誠然，連宋登陸後一連串的發展，帶動兩岸民間社會與經濟更蓬勃的交流，對於兩岸關係的開展起了積極的作用。隨之而來的則是民進黨與國民黨、共產黨、美國間的裂痕進一步擴大，而與兩岸三邊四角的歷史舞台更見遠離。在整體結構上民進黨逼使自己更深陷孤立與邊陲化的命運。因此，作為近代兩岸關係進程裡的重要歷史事件，「連宋登陸」即令不具有扭轉兩岸基本結構的決定性作用，但短期而言卻一定程度地影響行動者與結構的互動內容與態樣。在「美中台」大三角關係下，維持台海現狀雖是三方的共通說詞，但因為三方無不意圖爭取對「現狀」的主導權與詮釋權，在動態的互動過程中，新的模式化關係也不斷地被生產出來。可以說「連宋登陸」在兩岸關係演變史上，實具有一定的位置與份量，不能只以個別單一或孤立的事件的角度小視之。而不管在理論上或經驗上，本研究有下列的發現：

1. 「觀念」是兩岸各方行動者行動的本源。「連胡會」、「宋胡會」後，紅藍兩大陣營之間，在共同的意識型態基礎上，進行各種良性的互

動交往。綠營的民進黨不僅無法突破與對岸共產黨之間的僵局，即使陳水扁與宋楚瑜兩人精心構建的「扁宋會」，也因國家認同的歧異卒至怒目相向而破局。反是「宋胡會」在「兩岸一中」上的共識，意味著宋楚瑜對於紅藍合作的加盟，這個發展令陳水扁更往邊緣化的方向而行。

2. 「紅藍綠」小三角關係在形式與結構上突破過去的模態，產生國共聯手的新結構，民進黨在三角關係上被迫居於孤立的困境；但國共聯手在發展上也終究有其結構性的限制。就資源與規則的運作而言，權力缺乏了規則與資源為媒介恐難以運作，這是連戰與宋楚瑜缺乏官方身份的限制。同時，在中國雖是以黨領政，在台灣則黨屬正式體制外之物。黨與黨或領導人與領導人之間所搭建的任何系統，畢竟屬正式體制之外，即使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亦無法允許它無限制地膨脹與發展。兩岸政黨間平台的建構與過程終究具有先天性的不穩定與不確定。
3. 「紅藍綠」小三角關係在轉型後的新結構下，歷經結構化成的過程，也帶動了「紅藍綠」小三角關係在內容上的變化，民進黨政府深受「紅藍制綠」結構的影響，面臨座標位移滑向邊緣化的困境。而民進黨在國會極度弱勢，2008 年總統大選又失利時，其在兩岸關係上的角色乃更形邊緣化。

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是，當民進黨重新在野，依照中共的統戰邏輯，馬政府方是共產黨的主要對手，民進黨已成次要敵人，自「胡六點」顯露對民進黨策略調整以來，北京對綠營迭有統戰動作。當然，基於「一個中國」原則，相信此一統戰仍不可能跳脫「紅藍制綠」，不過，委實，在此新態勢下，「紅藍綠」三角關係未來將如何互動發展，結構化成結果兩岸關係的格局與內涵將呈現何等的變化，相信必有一番新貌，而有待未來探討。

## 參考書目

- Giddens, Anthony (李康、李猛譯)。2007。《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台北：左岸。
- Wendt, Alexande (秦亞青譯)。2000。《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上海：人民。
- 中共研究雜誌社資料室。2005。〈每月兩岸關係大事記〉《中共研究》39 卷 6 期，頁 177-87。
- 外交部。2005。〈「第六十屆聯大總務委員會審議相關友我提案」新聞說明會紀要〉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16846&ctNode=1099&mp=1>) (2005/9/14)。
- 朱松嶺。2005。〈兩岸政黨交流機制：影響力投放的新管道〉。《人民網》6 月 16 日 (<http://tw.people.com.cn/GB/14811/14871/3474814.html>) (2009/9/11)。
- 李英明。2001。《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和兩岸關係》。台北：生智。
- 林妙容、林淑媛、陳孝婷。2006。〈國共論壇前夕，政院促中共速協商〉《經濟日報》4 月 13 日，A2。
- 邱垂正。2007。《台海兩岸和平整合模式之建構》博士論文。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徐博東、馬淑明。2005。〈兩岸關係轉變的四點啓示〉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0666&secid=30686>) (2009/9/11)。
- 邵宗海。2006。《兩岸關係》。台北：五南。
- 崔慈悌、薛孟杰。2006。〈反廢統，傅布希派特使來台〉《工商時報》2 月 22 日，A4。
- 陸委會。2005a。〈「台灣民眾對中共制訂反分裂國家法的看法」民意調查初步報告〉 3 月 12 日 ([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at940313\\_02.htm](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at940313_02.htm)) (2009/9/11)。
- 陸委會。2005b。〈兩岸大事記——2005 年 6 月〉 (<http://117.56.123.1/big5/mlpolicy/cschrono/sc.htm#94>) (2009/9/11)。
- 董立文。2007。〈展望兩岸關係及中共對台工作〉《中共研究》41 卷 1 期，頁 113-16。
- 國台辦。2006。〈中台辦、國台辦就陳水扁推動「廢統」發表談話〉 2 月 26 日 ([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186](http://www.gwytb.gov.cn/zyjh/zyjh0.asp?zyjh_m_id=1186)) (2009/9/11)。
- 楊孟瑜。2004。〈美國在台協會新址定案租期 99 年〉《BBC 中文網》12 月 22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110000/newsid\\_4117600/4117673.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110000/newsid_4117600/4117673.stm)) (2009/9/11)。
- 經濟部。2007。〈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國家(地區)同期比表〉 (<http://cus93.trade.gov>).

- tw/bftweb/FSC3/FSC3050R.ASP?F\_TYPE=2&BYEAR=200701&EYEAR=200706&CYEAR=2006&CONTINENTAL=J&USER\_ID=&intType=1) (2009/9/11)。
- 經濟部。2008。〈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國家（地區）同期比表〉 ([http://cus93.trade.gov.tw/bftweb/FSC3/FSC3050R.ASP?F\\_TYPE=2&BYEAR=200801&EYEAR=200806&CYEAR=2006&CONTINENTAL=J&USER\\_ID=&intType=1](http://cus93.trade.gov.tw/bftweb/FSC3/FSC3050R.ASP?F_TYPE=2&BYEAR=200801&EYEAR=200806&CYEAR=2006&CONTINENTAL=J&USER_ID=&intType=1)) (2009/9/11)。
- 齊力。2000。〈社會結構與個人行動〉 (<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05/e-j0315.htm#結構>) (2009/9/11)。
- Adams, Jonathan. 2005. "Conditions Aren't Ripe." (<http://cc.bingj.com/cache.aspx?q=conditions+%22aren+t%22+ripe&d=76675399026372&mkt=en-US&w=54b60f73,b60cd87f>) (2009/9/11)
- Carpenter, Ted Galen. 2007. "Taiwan's Free Ride on U.S. Defense." April 23 ([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8203](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8203)) (2009/9/11).
- Copeland, Dale C. 2000.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pp.187-212.
- Ereli, Adam. 2006a.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Adam Ereli." January 30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0060.htm>) (2006/1/30).
- Ereli, Adam. 2006b.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Adam Ereli." February 21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1817.htm>) (2006/2/21).
- Ereli, Adam. 2006c. "Daily Press Briefing by Adam Ereli." February 22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1908.htm>) (2006/2/22).
- Giddens, Anthony.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82.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 Giddens, Anthony. 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laser, Bonnie S. 2006. "Discord on the Eve of the Bush-Hu Summit."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8, No.1, pp. 35-42.
- Lin, Cheng-yi, and Wen-cheng Lin. 2005. "Democracy, Divid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 No. 2, pp. 69-87.
- McCormack, Sean. 2006. "Daily Press Briefing." February 7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6/60618.htm>) (2006/2/7).
- Saunders, Phillip C. 2005. "Long-Term Trends in China-Taiwan Re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U.S. Taiwan Policy." *Asia Survey*, Vol. 45, No. 6, pp. 970-91.
- Schraver, Randall G. 2005.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 Commission Hearing: China's Global Strategy and U.S. Policy Responses." July 21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5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5\\_07\\_21\\_22wrts/scriver\\_randall\\_wrts.pdf](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5hearings/written_testimonies/05_07_21_22wrts/scriver_randall_wrts.pdf)) (2009/9/11).
- U.S. Congress. 2006.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dget Request for Fiscal Year 2007." (<http://www.internationalrelations.house.gov/archives/109/26078.pdf>) (2009/9/11)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Jul2005/d20050719china.pdf>) (2009/9/11)
-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pp. 391-425.
- Wright, Colin. 2006.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Impacts and Influences of Lien's and Soong's Visits to China on Partisan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ei-Mei Y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College of Maritime Technology,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supplemented by Alexander Wendt's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 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Lien's and Soong's visits to China. The visits enlarged cross-strait contacts. Despite Chen Shui-bian replaced "active opening" with "active management," the market dominated. Chen's "cease to function" and "cease to apply" were fiercely rebuked by the Pan-blue, the CCP, and the US, and, hence, marginalized the DPP. Even though the visits did not change cross-strait structures, they affected the contents. For Wendt, "ideas" mattered and the DPP was marginalized under the Blue-Red alliance. For Giddens, new structures are conditions for actors in reproducing new structures. As time shifts, continuous interactions and recurrent production of structures are shaping new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simultaneously, there emerge some changed and unchanged structural features.

**Keywords:** structuration, social constructivism, idea, Lien's and Soong's visits to China, cross-strait relations